

张闻天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

杨五星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 要:张闻天在军事方面有许多独到见解。1933年到1938年张闻天为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为红军的指导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在中央苏区时开始初步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做了系统阐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张闻天;毛泽东军事思想;贡献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4)02-0003-04

从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到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的6年是党的历史上一段非同寻常的时期。这一时期,以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为转折点,党的事业经历了遵义会议以前从胜利走向失败,遵义会议后“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西北一隅走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1]。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由于这一时期在党内处于特殊地位,张闻天对于这一伟大转变的实现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本文拟从军事方面论述这一时期张闻天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

一、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新确立为红军的指导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1年2月,张闻天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从此走上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当时的临时中央“是按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进攻’路线和具体指示来观察形势制定策略的,是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来行事的”^[2]。同时,也由于张闻天“过于盲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从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由于他长期在国外学习,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后来又在上海临时中央工作。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这就使他很容易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1]这样,张闻天跟着临时中央犯“左”倾路线错误就在所难免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

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为了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张闻天参加了博古导演的反对“罗明路线”的错误党内斗争,并掀起了一场以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由于“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使张闻天“逐渐觉察到‘左’倾错误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障碍物,反对‘左’的一面开始逐渐滋长”^[1]。由此开始,为结束“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对红军的领导,重新确立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张闻天与博古、李德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长征前张闻天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斗争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福建事变前后,一次是广昌战役前后。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而博古则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嘲笑博古是“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3]。批评博古对“福建事变”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使红军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绝好机会。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打垮了十九路军后重新部署兵力,向中央苏区猛扑过来。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但是博古、李德根本不听,而是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

收稿日期:2003-12-15

作者简介:杨五星(1969—),男,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外”。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敌,终因兵力消耗巨大,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等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并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4]。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被编在一个纵队里,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区别于“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使张闻天同毛泽东在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逐步一致起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方面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1]。以老山界为标志,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对此,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5]

1934年12月14日红军攻占黎平。在黎平城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博古、李德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会议进行表决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在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张闻天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决定“新根据地的建立,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6]从而否定了博古、李德错误的战略方针,采纳毛泽东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思想,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张闻天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一起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会议做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6]。这实际上排斥了李德,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这是在组织上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这样,张闻天等为挽救红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开始一步一步地向胜利方向迈进。

1935年1月15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召开。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取消三人团。这实际上是正式撤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重新为党和红军所认识,重新成为党和红军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张闻天为这一转折的实现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后来的党史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当时“如果在中央领导中没有一个常委出来领衔代表正确的观点来做这样的报告,就很难想像会议能那样顺利地获得成功”^[1]。

二、对在中央苏区时开始初步形成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做了系统阐述

遵义会议在结束时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1935年2月8日,红军到达院子,张闻天在这里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问题上,《决议》指出:在敌人实行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方针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同时指出:“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6]

在运动战和阵地战问题上,《决议》指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没有像在一、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采取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地证明了。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实际上是对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6]

在集中优势兵力与分散兵力问题上,《决议》批评单纯防御路线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兵力。这种分散兵力的结果,就是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而使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决议》阐述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指出:“由于敌人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集中优势

兵力,粉碎敌人的‘围剿’”^[6]。

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决议》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批评他们实行了战役战斗持久战的方针,单纯同敌人拼消耗的“拼命主义”。《决议》阐述了中国革命中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相统一的思想,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战。苏维埃革命就是在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这是一个基本准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每一次‘围剿’与每一次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6]

在作战目标问题上,《决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坚持“不放弃苏区寸土”,结果使自己丧失了根据地的做法,提出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指出:“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扩大苏维埃领土。”^[6]

在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问题上,《决议》批评那种把两者相互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拼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出来。”^[6]

在战机选择问题上,《决议》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指出:“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6]《决议》还进一步强调:“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立即应拒绝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争同样是罪恶。”^[6]

这些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总书记位置上的张闻天》这本书就评价说:“像《决议》这样密切结合反‘围剿’战争的具体实践,从理论上给予简明、系统的论述,这在以前的文件和著作中是罕见的。因此,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张闻天的确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三、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战争的实践使张闻天更加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张闻天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于是,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这样,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立。但是,这种地位还很不巩固,曾先后几次面临挑战。对此,张闻天竭尽全力支持毛泽东。

针对林彪等人埋怨红军尽走“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并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建议。5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里会议。他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使遵义会议以后确立的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对此,《在总书记位置上的张闻天》是这样评价的:“显然,当时如果没有党内总负责人张闻天的鼎力相助,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难以想像的”^[1]。

同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制定的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但接着出现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有利形势和光明前景又布上了令人十分焦虑的阴云。张闻天对张国焘试图拉拢自己与他“很好合作”,“妄图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1]的错误行径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双方经过多次较量,最终以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破产。全面胜利地结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抗战初期,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延安,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并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而王明头上的那个“共产国际代表”的光环确实也迷惑了不少同志,毛泽东又一次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就像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所说的“而我是孤立的。”^①这时张闻天又一次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毛泽东。1938年11月,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至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完全确立。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Z]. 1943-11-13.

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开始负总责到六届六中全会后自己主动把总负责的位置转给毛泽东共有4年时间,《张闻天传》对张闻天在这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张闻天总是这样,遇事都同毛泽东商量。他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配合得十分融洽。党内‘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重要关键。”^[4]

四、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

张闻天同志的一生主要从事理论工作,只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才受命于危难之际,勇敢地承担起了领导全党、全军实现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但是,就在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这短短4年的时间里,张闻天把他那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军队建设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针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军队的组织建设上,张闻天强调组织方式要与战争环境相适应。张闻天就任党的“总书记”后,就中央苏区问题立即复电项英,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6]。1935年2月9日,张闻天在扎西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毅然决定“缩编”红军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指明“缩编”的指导思想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

在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上,张闻天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要保证党的路线的执行”的思想。他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不仅是要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并且要保证党的路线的执行,要使红军成为党与苏维埃政策的坚决执行者,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7]

党和红军安家陕北后,在瓦解敌军上,张闻天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一些意见。他指出:“我们争取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武装力量争取,一种是政治争取。现在对六十七军敌对的军事行动需限于极窄小范围之内。对五十七军则要军事政治两方面进行,须以相当武装对付、同上级的谈判以及对中下级的工作同时展开。因此二者结合上两军工作有些不同。”^[7]为了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张闻天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成立了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两个工作机构。所有这些为争取东北军及西北军,瓦解敌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上,张闻天论述了持久战

的战略思想。早在1936年4月20日,他就在一篇题为《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断,他说:“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7]。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闻天发表了《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文章对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的命题作了两个方面的论证后得出结论:“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而“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这里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7]。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又撰写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战》一文,文章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的对比,说明中国“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7]。

在抗日战争的作战方式上,张闻天论述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式。张闻天15日发表了《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宣告:“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山西与中原的前进”。并说明了这个战略支点的伟大意义:“共产党要在北方做出一个模范例子,证明给全国人民看:不论日寇军队的飞机大炮怎样厉害,不论日寇怎样占领了我们的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我们仍然有办法同敌人作战,消耗它、疲惫它、瓦解它、打击它,最后完全驱逐与消灭它。”^[7]

这一时期,张闻天同志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为党和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安家陕北,顺利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里,也闪耀着张闻天同志的智慧和功绩。

参考文献:

- [1] 李涛.在总书记位置上的张闻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6,17,39,48,61,70,79.
- [2] 程中原.张闻天的非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0.
- [3]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一)[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14.
- [4] 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221—222,318.
- [5]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A].李剑.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121.
-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436,442,445,448,447,450,446,451,445,450,467.
- [7]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二)[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60,98,95,246,335,374.